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蓝色东欧
第3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捍卫热情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Adam Zagajewski

DEFENSE OF ARDOR



A DEFENSE OF ARDOR

捍卫热情

Adam Zagajewski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蓝瓶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捍卫热情 / (波) 扎加耶夫斯基著 ; 李以亮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5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360-7520-7

I. ①捍… II. ①扎… ②李…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162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4-137 号

ADEFENSE OF ARDOR; Essays by Adam Zagajewski, translated by Clare Cavanagh
Copyright © 2002 by Adam Zagajewsk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lare Cavanag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捍卫热情
HANWEI REQ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75 2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有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娅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诗人的左手

(中译本前言)

李以亮

近年，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已开始为汉语读者所熟悉。虽然还不像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那样广为人知，但是，扎加耶夫斯基也因其诗歌独特的风格，因其作品现实、历史维度与形而上维度的交织呈现，博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二〇一三年三月，诗人来到中国广州接受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这不仅使大家得以一睹诗人风采，更使不少中国读者得到诗人的亲炙。不过，应该说，扎加耶夫斯基在汉语的接受，也就是汉语读者对他的阅读和理解，这些都尚待深入。对他的诗歌来说是这样，散文、随笔更是这样。

作为“新浪潮”（也称“六八年一代”）的重要一员，扎加耶夫斯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崛起于波兰诗

坛。成名之时，扎加耶夫斯基主要写诗歌和小说（小说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以波兰语和德语发表），但同时也发表文学宣言，以及关于各种问题的散文、随笔文章。我们说扎加耶夫斯基是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忽视波兰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遗产，不，我认为恰恰相反，毋宁说他（和他那一代人）所作的，正是以自己的反思与创造性，激活并发展了置身其中的传统。这位毕业于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哲学系的诗人，后来谦逊（也许不只是谦逊）地认为，自己所受的哲学教育贫瘠而有缺陷，他本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过他的随笔作品后就会发现，在他身上诗性与哲理的结合是多么紧密。学者的严谨、思维的严密、思想的力度、广阔视野，以及诗人身上感性的润泽，他的真切、反讽、幽默，这些都是多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扎加耶夫斯基以母语——波兰语写作，四十多年里，诗歌和随笔写作一直在同步、交叉地进行，出版过多部散文、随笔集，包括《第二种风》（一九七八）、《团结和孤独》（一九八六）、《两座城市》（一九九一）、《另一种美》（一九九八）、《为热情辩护》（二〇〇二）等。迄今也有四部随笔作品已被翻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分别是：《团结和孤独》（一九九〇）、《两座城市》（一九九五）、《另一种美》（二〇〇〇）和《捍卫热情》（二〇〇四）。大致来说，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写作，与诗歌写作一样，遵循了一个相似的轨迹，即逐渐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介入，转移到更个人、更内在化的精神生活方面，但是，这种转化并非排除了对政治性的关注，而是经由更为个人化的经验，直面更为本质性的思想问题。

《团结和孤独》写于波兰民主化之前，作者深感在那样一种体制下，集体生活对个人精神的挤压，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间给“孤独”，也就是给“文学、艺术、沉思和永恒”。但是，扎加耶夫斯基并不是要以“孤独”反对“团结”，而是试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文中，作者描述了集权政治下的无奈和反抗的兴奋之感，但更主要

的则是在思考波兰的未来。如果说，存在“对手”的生活是那樣的（压抑、紧张、灰暗、绝望），在失去“对手”后，精神的生活有可能？扎加耶夫斯基显然不愿被对立的事物束缚、被它们“带走”，他有更宽广、高远的精神目标。

《两座城市》的主题比较多重，其副题为“论流亡、历史与想象力”，书里展开的内容十分丰富。开篇是近七十页的长篇散文同题文章。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维策，前者利沃夫是属于上一代人，神话般的、记忆与失落的城市，后者格里维策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让他感到“仇恨和绝望的苏式统治”无处不在。作者在对二者进行的对比中，揭示了时代与现实的一些真实状况，读来生动而发人深思。此外，此集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历史问题的沉思，以及关于几位欧洲作家的分析与评论。

《另一种美》则是作者在五十岁后所写，近似于回忆录性质的、单独成书的长篇散文。在书中，作者深情刻画了他当年到波兰古城克拉科夫求学这一时期的生活，他的所见、所闻、所思。这些对于理解作者后来的一些诗作大有帮助。文中，作者还集中表达了一个独特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曾得到诗人米沃什的特别欣赏），就是作为书名、作者亦写进同题诗歌中的一个观点：“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存在安慰，在他人的/音乐，他人的诗里。/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这对传播甚广、但被庸俗地理解了“他人即地狱”一语，可谓一个有力的矫正。

《捍卫热情》是作者距今最近的一部随笔集。诗人将“热情”理解为“对存在于世界和艺术里的黑暗的镇痛剂”，他有感于“写作与思想中近年出现的贫瘠、苍白、灰暗和乏力”，追本溯源地思考了诗歌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崇高与粗鄙”、“诗歌与怀疑”、“诗歌与反讽”，等等）。诗人在为灵感、为热情辩护的同时，也力图理解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在诗歌上的精神导师（如恰普斯基、赫伯特、米沃什等人），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和为人，寻找

一些有利于恢复诗歌之美与热情的启示。这本随笔集，为我们理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及其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便捷而有效的途径。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论题虽然也极为广泛，哲学、美学、诗学都在其中，却非常具有针对性，或者说很有“问题意识”、“现场感”，比如“崇高与粗鄙”、“诗歌与怀疑”这样一些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对我们（中国诗人和读者）也是颇有启示与警醒意义的。本书另一重头戏，便是作者对他精神上的导师，如恰普斯基、赫贝特、米沃什（或许还包括尼采）的精彩解读和追忆，其中既有生动的交往、体会的细节，也贯穿着作者个人深刻的发现、独到的理解。而且，文中充满对于上述人物的崇敬、仰慕之情，非常动人，这些散文可说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作者目前正在致力于出版他新写的随笔集，部分文章我在一些地方读了，有的还翻译了。应该说，作者的思想仍然是很活跃的，具有一贯的洞察力。在扎加耶夫斯基身上，明显地继承了他的精神导师恰普斯基，那样一种永不知足的、永远探求而“延缓做出评判”的精神。诗人余光中曾有“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戏称，很多诗人也有把散文、随笔当作“副业”的习惯。但是，我在读过扎加耶夫斯基的一些散文和随笔集后感到，它们到底算主业还是副业？还真不好说，因为我感到，至少扎加耶夫斯基是把它们当“作品”来写，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很高，而且难得地融合在了一起。由于我的才疏学浅，很可能未能毕现其高妙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诗人的左手（中译本前言） / 李以亮 / 1

捍卫热情 / 1

粗鄙与崇高 / 20

尼采在克拉科夫 / 44

劳作与名声 / 57

开始回忆 / 82

理性与玫瑰 / 100

反对诗歌 / 104

诗歌与怀疑 / 118

暑假的结束 / 127

我们应该访问神圣的地方吗？ / 136

克拉科夫智识区 / 142

灰暗的巴黎 / 145

年轻诗人们，请阅读一切 / 149

波兰语写作 / 154

捍卫热情

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从格利维策到克拉科夫，从克拉科夫到柏林（两年时间）；然后，到巴黎，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从那里，到休斯敦，每年待上四个月；最后，回到克拉科夫。我的第一次迁移是非自愿的，受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一份国际协议。第二次迁移，只是普通的渴望受教育的结果（那时，年轻的波兰人认为，只有在古老的克拉科夫才能获得一种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还寻求的话）。第三次迁移背后的冲动，是由于不同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好奇心驱使。第四次迁移背后的动机，则是基于我想谨慎称为的“个人性质的原因”。最后，第五次迁移（到休斯敦），既有好奇心（对美国的好奇）的刺激，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

在一百多年里，利沃夫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加利西亚省的首府。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了来自西欧与东欧的文化影响（虽然东欧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远不如在维尔诺，甚至不如在华沙）。格利维策曾经是普鲁士王国一个地方省的要塞小城，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将它割让给了波兰。在学校里，我学习过俄语和拉丁语；我也上过英语和德语的私人课程。我的家庭，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被迫的迁徙是一个征兆，预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在一九四五年，我的国家实际上隶属那个东方帝国，却诡异地西移了：这种移动的后果不久之后就会浮现出来。

我的祖父精通两种语言：波兰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因为他是由他

已故母亲讲德语的家庭养大的。但是，在纳粹占领时期，他却从未有过要求取得德国侨民身份的念头。年轻时，他发布过关于阿尔布莱克·冯·哈勒^①的博士论文，世纪之交，曾以德语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在克拉科夫，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那是波兰传统里最好的东西：留在建筑艺术和博物馆展品里的文艺复兴的遥远的记忆，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时期的活力以及当时出现不久的民主反对派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期，打动我的西柏林，是一个普鲁士的首府与一个着迷于曼哈顿、前卫派的轻浮城市的独特结合体（有时我怀疑，当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视柏林墙为马塞尔·杜尚的另一件作品）。在巴黎，我没有遇到那些伟大的智力特殊的人，伟大的法兰西文明的主宰者——我来得太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巴黎的美，作为少数几个欧洲大都市之一，它永葆青春的秘密（即使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②的野蛮主义，也没有破坏这座城市的生命的连续性）。最后，在简单所列的这一系列城市之后，我到了休斯敦，一个铺展在平原上，没有历史的城市，只有常青的橡树、计算机、高速公路和石油的城市（当然，还有极好的图书馆和辉煌的交响乐团）。

要经历些许时间之后，我才懂得，我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一是战争的灾难，故乡的丧失；二是我后来的漫游——只要我不太偷懒，不断学习我所不停变换的地方的语言和文学。我就这样到了这里，像一个小潜艇上的乘客，潜艇不止一个，而是有着四个潜望镜。其中，主

^① 阿尔布莱克·冯·哈勒（1708—1777），瑞士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博物学家和诗人。

^② 1859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09—1891），负责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奥斯曼拆除了巴黎的外城墙，建设环城路，在旧城区开辟出许多笔直的林荫大道，并建众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广场、公园、住宅区等，但是他也拆掉了许多历史遗产和文物，对巴黎旧城的破坏一直存在历史争议。